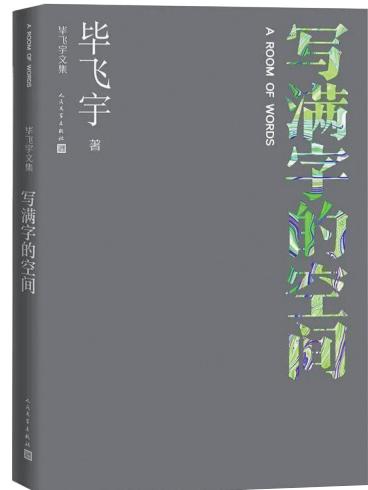


好书摘读



谈艺两则

毕飞宇

短篇小说

我所渴望的短篇小说与经验的关系并不十分紧密,相对说来,我所喜爱的好的短篇似乎是“不及物”的。因为“不及物”,所以空山不见人,同样是“不及物”,所以但见人语响。

有时候,我认为短篇这东西天生就具有东方美学的特征。东方美学是吊人胃口的美学,我经常用一个庸俗的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比如说一块羊肉,你把它烤一烤,它散发出来的香味让你直流哈喇子,简直要了你的命,可是,你真的把它送到嘴里,也就是那么回事。这里头还有一个“大”与“小”的关系,一块羊肉能有多大?然而,只要在街头烤了那么一下,神话马上出现了,“羊肉”变得巨大无比,十里长街它无所不在,你看不见它,可它却放不过你,是眼不见为实的,它具有了压倒性的、统治性的优势。这就是“味道”的厉害。“味道”是事物的属性,却比事物大,比事物大几百倍。

短篇小说就是一块羊肉,不同的是,它被“烤”了那么一下。短篇是怎么“烤”出来的呢?我不知道。但是有一点是显而易见的,短篇难以回避它的技术性。在艺术问题上谈技术是危险的,它不如“主义”超凡脱俗,更不如“主义”振奋发聩。但是,技术有它的实践性,艺术同样有它的实践性,你可以无视它,但是,只要你从事,你绕不过去。写作和美术不同,和音乐不同,和竞技体育更不同,这些东西没有专门的细节训练是不可想象的。写作不一样,写作有它的宽泛性,有时候,会写字就可以了。这种宽泛性容易掩盖写作的技术。所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中国文学“事件”多,思潮多、口号多,好的小说,尤其是好的短篇小说却不多,这和写作的宽泛性有直接的关系。写作不再是艺术生产,而直接是艺术股市,甚至于,是艺术期货,带有买空卖空的性质。

几年前我读过一篇文章,文章说,好小说一定是最不像小说的小说。这是标准的回避常识的说法,这同时还是好大喜功的说法。西瓜不像小说,液体牙膏不像小说,浮肿不像小说,鼻涕也不像小说,这又能说明什么?只是一句空话。所以我坚持这样的观点,好小说应当经得起“意义”(如果有意义的话)的考验,同样也要经得起技术性的文本考验。

中篇小说

我所渴望的中篇首先应当具备分析的特征,分析的特征确保了事物的本质能够最充分地呈现出来。本质总是坚固的,可信赖的,有了这样一种底色,你想描绘的人物大多不会游移,从而使人物一下子就抵达了事件。这不是什么深刻的道理,我们所缺少的是坚定不移的实践,实践的愿望、能力与勇气。

我们看到了大量的放纵的创作,放纵的作品大多是人浮于事的。一些批评家们眼在后面起哄,把“人浮于事”的创作上升到了自由的高度。放纵和自由是完全不可对等的东西,它们是貌合的,却更是神离的。王安忆有一个说法我十分地赞同,她强调小说的“推导”功能。“推导”这个词带有形式逻辑的学究语气,但是,在我看来,“推导”是小说中——尤其是中、长篇——必不可少的“判断的控制”(韦恩·布斯《小说修辞学》)。由人的行为(或内心)到人,到人的关系,再由人的关系到人,到人的内心(或行为)。

与短篇小说相反,我所渴望的中篇与经验有着血肉相连的关联。它是“及物”的,伸手可触,一开口说话就带上口红和晚餐的气味。

(本文摘选自《写满字的空间》,毕飞宇著,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悦读

英雄的赞歌,人民的褒奖

——谈谈新书《勋章》

勋章

书名:《书香湖南 湘版好书》

——湖南省全民阅读活动办公室主办

吴向红 何萌

熠熠生辉的勋章,代表着获得者的卓越功勋和无上荣光,也代表着激励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昂扬奋进的伟大精神动力。

新出版的《勋章》一书,全面反映自土地革命战争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红色勋章的光辉历史,发掘勋章的精神内涵,展现勋章获得者的生动事迹和精神风貌,对于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推进党史学习教育常态化长效化,无疑意义重大。

一部浓缩的中国共产党奋斗史

以勋章和奖章作为国家奖赏体系的核心,是一个国家对于荣誉褒奖的制度化、规范化体现,同样也是记录这个国家历史的最直观、最有效的物证。

1931年12月,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设立最高荣誉奖章——红旗勋章,以嘉奖为苏维埃政权英勇奋斗作出突出贡献的红军指战员,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等红军的主要领导人成为这一荣誉的首批获得者。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第一枚勋章。

1955年2月,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决定颁发八一勋章、独立自由勋章、解放勋章,嘉奖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中国工农红军时期、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的有功人员,朱德、彭德怀、贺龙等6万余人受奖。这是新中国成立后首次以国家名义大规模授勋,也是国家建立统一的功勋奖励制度的开始。

20世纪80年代,中央军委在革命战争时期入伍或参加革命工作的军队离休干部,颁发中国人民解放军红星功勋荣誉章、中国人民解放军独立功勋荣誉章和中国人民解放军胜利功勋荣誉章,10万余枚功勋荣誉章在八一前后颁发给了全军的离休干部。

进入新时代,党和国家将对功勋模范的表彰上升到法律的高度,为表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保卫国家中作出巨大贡献、建立卓越功勋的杰出人士,先后授予了“八一勋章”“友谊勋章”“共和国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七一勋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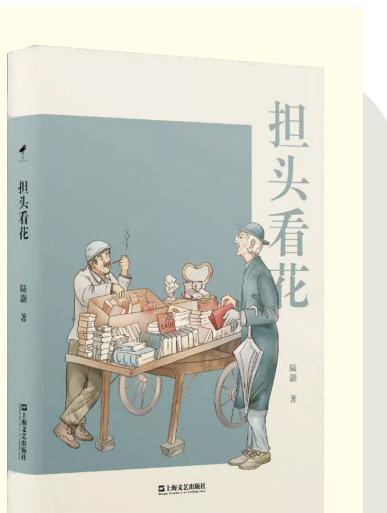
走马观书

《担头看花》

陆灏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沪上陆公子”陆灏先生时隔四年后的新著,篇幅耐读、耐味,更兼设计之精良、插图之精美,令人爱不释手。

书名取自宋人熟语“卖花担上看桃李”。其内容包括钱钟书的猫、俞平伯与侦探小说、容庚之被逐出北大、黄裳五次题跋的《印存玄览》……有趣闻,有史事,有藏品,搜罗抉剔之间,都是活活泼泼的精神气象。本书设计制作精良,更有20余幅精美插图,特别收录钱钟书批改的校样、卞之琳赠作者信札、方重旧藏英文书等,令人大饱眼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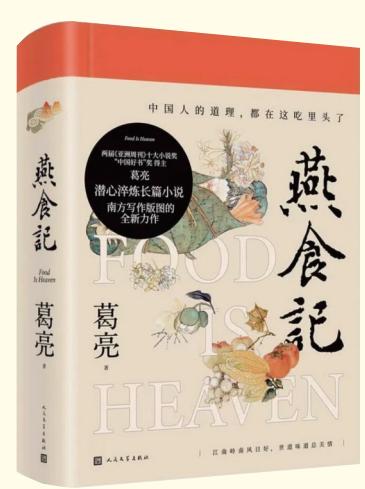


《燕食记》

葛亮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本书是“中国好书”奖得主葛亮继《北鸢》《朱雀》后,潜心耕耘的全新长篇小说,近年南方写作版图的又一力作。

小说沿着岭南饮食文化的发展脉络,以师徒二人的传奇身世及薪火存续,见证辛亥革命以来,粤港经历的时代风云兴变。笔触深入近代岭南的聚散流徙,从商贾政客、革命志士、钟鼎之族、行会巨头等传奇人物到市井民生,小说借关于美食的跌宕故事,以细致入微的文笔,生动描摹出中国近百年社会变迁、世态人情的雄浑画卷。



编辑手记

我为《孙康宜作品系列》做校读

李保阳

世间事,往往奇妙得不可以言喻!我为孙老师校读《孙康宜作品系列》书稿,就是一个奇妙的见证!

2020年3月,当新冠病毒席卷新大陆的前夜,我正在休假,那段时间每天开车跨过特拉华河,到普林斯顿大学葛思德东方图书馆看书。有一天傍晚,我借了几本书准备回家,瞥见书架一角有一册《耶鲁潜学集》,因为“耶鲁”两个字,心想作者不会就是孙康宜教授吧。20多年前,我在陕南读大学的时候,曾经读过孙老师的《情与忠:陈子龙、柳如是诗词因缘》。但是对孙老师印象最深的,是传说中她那100平方米大的书房“潜学斋”。于是想都没想,顺手就从书架上抽出那本《耶鲁潜学集》一起借出。

读了书中《在美国听明朝时代曲——记纽约明轩〈金瓶梅〉唱曲大会》那篇文章后,感慨良久。2016年秋,我到纽约访书10多天。有一天,信步闲走,竟然走到了中央公园旁的大都会博物馆。说来也是奇妙,在那迷宫一样的博物馆里,我竟然上了二楼,歪打正着地闯进了一座江南园林。那时候我还不知道这座园子叫“明轩”,也不知道在35年前,这里曾发生过一件当时蜚声海外汉学界的丝竹雅集。这次雅集,以耶鲁大学傅汉思先生的夫人张充和女士演唱《金瓶梅》小曲为中心,参加的数十人,多是当年北美汉学研究界一时之选。

20世纪七八十年代,普林斯顿大学的中国明代研究很是兴盛。关于普大的明代研究,有一个有趣的故事值得一提。1975年前后,当时任教于耶鲁大学的张光直教授,要写一本有关中国人饮食文化的书,他请牟复礼教授写有关明代一章。牟先生想来想去,关于明代饮食最直观的材料就是《金瓶梅》中大量关于宴会细节的描写,于是他发挥了西方学者一贯的实证学风,专门请了普大一众师生到他府上聚餐,让擅长中国厨艺的牟夫人陈效兰女士掌勺,按照《金瓶梅》全书中描写的22道不同菜品谱式,烧制了一席《金瓶梅大宴》。

上述故事,也反映了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古典研究在美国的一个繁荣时代的侧影。后来的中国文学研究重心,逐渐向现代研究转型了。对于古代文学专业的我来说,读了孙老师的那篇文章后,遂对那段美国汉学研究,产生了一种“东京梦华”式的想象和感慨。尤其是孙老师在《在美国听明朝时代曲——记纽约明轩〈金瓶梅〉唱曲大会》一文中,详细记载了明轩的建造过程。原来我当日所见的那精致的园子,是

一砖一瓦地由中国万里跨海而来,于是不由得让人对那一砖一瓦顿生一种“我亦飘零久”的跨时空共情。

读完那篇文章后,我在耶鲁东亚文学系的网页上找到孙老师的E-mail地址,给她写了一封长长的读后感。当时也没有奢望孙老师会回信给我,孙老师当时76岁高龄,仍担任东亚文学系研究所的负责人。没想到过了3个星期,我都快要忘记这事了,突然收到孙老师一封长长的回信。她除了向我道歉迟复邮件的原因外,在信中还附赠了台湾出版的《孙康宜文集》五卷电子本全帙。这完全出乎我的意料。

大约一周后,当我刚刚拜读完《走出白色恐怖》时,收到孙老师的一封邮件,在那封邮件中,她告诉我,她正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中文简体增订版《孙康宜作品系列》,因为她的文章非常专业,她本人一直在海外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希望能够找一位“特约编辑”,为书稿的编辑工作提供必要的学术和技术支持。孙老师告诉我,她经过认真考虑之后,打算请我帮她承担这个工作。

我是古典文学专业毕业,又做过编辑,能得孙老师信任,自感不胜荣幸。同时我还有一点小私心:即我一直在国内上学,没有机会接受欧美现代学术训练,对海外的中国学研究甚感隔膜,通过这次系统“细读”孙老师半个世纪以来的学术结晶,可以帮助我了解欧美汉学研究的方法、历史和现状。经过大约一周的相互磨合、调整,以及工作试样,但最后却因为一点点的技术障碍,没有了那个“特约编辑”的名分,但仍由我为孙老师担任校对工作。

通过校读作品系列全稿,我当初的那个“私心”之愿实现了。我以孙老师的文字为起点,对海外汉学研究有了一个全景式的了解。

(《孙康宜作品系列》,孙康宜 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玉香闲情

国庆随想

李慕尚

国庆节到了,突然想起了读中学时语文课本中的《最后一课》。这篇文章是法国作家阿尔丰斯·都德写的,讲述的是在普法战争中被强行割让的一所乡村小学,在上着告别自己母语的最后一堂课,通过一个孩子的眼光来展现整个沦陷区的屈辱和对自己故国故土的深切思念。国家,这个概念,在这个时候显得尤为可贵和高大。

国家,是由领土、人民、政府三个要素组成的,国家也是政治地理学名词。从广义的角度说,国家是指拥有共同的语言、文化、种族、领土、政府、历史的社会群体。从狭义的角度看,国家是一定范围内的人群所形成的共同体形式。

中华民族有着5000年的文明,但作为国家,应该得从夏朝算起。

“中国”一词,最早见于西周初年的青铜器“何尊”铭文。何尊铭文上有“唯武王既克大邑商,既迁于天,曰:余其宅兹中或,自兹以安”。这里“或”字即西周金文中的“國”字,意思是说:武王灭商后祭告于天说:我将在此地建都城,在这里治理民众。这里的“中国”实为国都、首都的意思。

“中国”一词所指范围,随着时代的推移而经历了一个由小到大的扩展过程。当《尚书》上出现“中国”时,仅仅是西周人对自己所居关中、河洛地区的称呼;到东周时,周的附属地区也可以称为“中国”,“中国”的含义扩展到包括各大小诸侯国在内的黄河中下游地区。而随着各诸侯国疆域的扩张,“中国”成了列国全境的称号。秦汉以来,又把中原王朝政权统辖范围之内的地区都称为“中国”,“中国”一词终于成为我国的通用名号。

国家,表面上看去,距离我们老百姓很远,但其实又跟我们每一个人都休戚相关,国家强大了,我们老百姓每一个人的人权和安全才能有保障。

现在国际局势动荡不安,如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冲突,之前有伊拉克战

争、海湾战争、阿富汗战争等,国家不保,老百姓会怎么样呢?美国的导弹把老百姓的民房炸了,死伤无数,老百姓的生命安全都没有保障,而美国人只说了一句,按错了按钮,这是多么可悲的事情。国家弱小,就会备受欺凌,从古至今都适用。所以爱国主义特别重要,因为爱国就是自己的家。

唐代戴叔伦《塞上曲二首·其二》写道:汉民族帜满阴山,不遣胡儿匹马还。愿得此身长报国,何须生入玉门关。慷慨豪迈,吟咏了壮士为了保家卫国舍生忘死的豪迈情怀!

宋代文天祥的《扬子江》:几日随风北海游,回从扬子大江头。臣心一片磁针石,不指南方不肯休。文天祥的爱国之心在这首诗中展露无遗。或许有人觉得“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更加视死如归,大气磅礴,但是“臣心一片磁针石,不指南方不肯休”流露出的坚定爱国之情却更让人动容!

清代徐锡麟的七言绝句《出塞》:军歌应唱大刀环,誓灭胡奴出玉关。只解沙场为国死,何须生入玉门关。徐锡麟是近代资产阶级革命家、诗人。在这首诗里,他运用了很多反映古代将士英勇征战、为国捐躯的典故,以抒发其为国效力的豪情壮志,表达了愿为推翻帝制,振兴中华英勇献身的崇高精神。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现代诗人艾青的《我爱这土地》,感情强烈而内在,基调深沉而忧郁。作者写这首诗时,正值武汉失守、日本侵略者的铁蹄疯狂地肆虐在中国大地上。作者抱着对祖国的强烈热爱以及对日本侵略者的满腔仇恨,写下了这首《我爱这土地》,感人至深。

几千年来,在中国这片热土上,涌现了无数为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而前赴后继的志士仁人,他们是真正的爱国者,是民族的英雄。能够献身祖国的事业,为实现理想而斗争,这是再光荣不过的事情了。